

想起那只麻雀

坐久了就想站起来,站起来就习惯性地走到飘窗前。平视窗外的树、花、草,颇感悦目养心。住在一楼就有这样的方便。这也是我选住一楼的理由。

近日观赏窗外,若有所失。想了一会儿,原来是好久不见鸟儿了。去年还时常看见白头翁,在小园里的杏子树上、油桃树上,啄弄花朵,今年就没见过。麻雀去年就见得差不多了。几只麻雀在窗前一泥台上,或泥土地里,一跳一跳的,点头磕地,曾是常见的景。小时候也曾奇怪麻雀为什么不走路,总是跳跃式前行。如果我们人类也只会跳跃移动,多不方便呀。那时没书翻看,没电视科普,没网络百度,谜就是谜。不久前,闲来又想起这未解之“谜”,百度后知道,麻雀后肢的胫骨跗骨和跗跖骨之间没有关节,胫骨和跗骨间的关节不能弯曲,没有关节可让它走或跑起来。

麻雀是我最早相识的鸟了。家乡麻雀成群,尤其是收割季节。大人们里里外外忙活不息,叫我们小毛孩留心晒谷场,驱赶来偷吃粮食的麻雀。要说麻雀“偷”吃,真乃不实之词。麻雀一来就是一群,很容易暴露目标,而且叽叽喳喳嚷嚷不停,哪有不被发现的事。在麻雀看来,来饱腹或充饥一下,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没必要鬼鬼祟祟,小家子气。然而我们人类不这样认为,自己也青黄不接,慷慨不起呀;而且像“不和女神厄里斯”一样不清自来,不循礼节,恣意待见呢。十九世纪,德国、英国、美国就曾进行过大规模灭杀麻雀的行动。二十世纪上叶的苏联、中叶的我国,也有过此类“除害”行动。

驱赶麻雀,与田间劳动比起来,那是轻松愉快得不能够的事,然而也很难得心应手。心里想一招制敌把麻雀打死,但它们灵巧得很,尽管不能奔跑,但起飞特快,竹竿再长也打不着它们。它们耳朵也特别灵敏,你想悄悄靠近偷杀,总被识破阴谋。有一只起飞,全体立即起飞。你一松懈稍息,它们又来了,让你不得休闲。其实麻雀也“青黄不接”,庄稼还没

成熟时,就在田间抢先“尝鲜”了。农民就在田边角竖起稻草人,来吓唬麻雀。一长一短的竹竿或树棍,绑成“十字架”,用稻草秆秆上扎成“人”形,两边的“手臂”可在风中摇动,有时还加上红布带,看似真人晃动手臂,对麻雀带来似有若无的威胁。

更让农民痛恨的是,麻雀喜欢在屋檐房顶上做窝。那时民房和生产队房子都是草房,密密麻麻的麻雀窝让房子漏雨水,生产队仓库的粮食有受潮变霉的风险。怎么办?采取什么措施?生产队领导一次次争论到面红耳赤,直至吵架,最后也无奈何。记忆犹新,当年全民“除四害”运动,消灭麻雀是最重要的任务。我在小学读书,有一次正上着课,一只麻雀竟然飞进我们教室。那时农村小学只有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一、二、三、四年级共享。老师叫关上门,停课,大家叫喊哄哄,让它飞进教室飞个不停。终于累得飞不动了,站在横梁上,被老师举起教杆一下子打中,呜呼了,却让我莫名陡生了一丝怜悯之心。那是我最难忘记的一只麻雀。

在文人士大夫眼里,麻雀似乎也不招待见。《史记》中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乃是常被引用广传天下的。麻雀不仅褐色单调,与美丽无缘;而且块头小,与强壮无缘;更是飞不高,与翱翔无缘。大自然不曾厚待,只能自强不息。麻雀的生命力还是可以的,栖息环境多样,世界各地分布。据国际鸟盟2015年估计,约有1.9亿至3.09亿只成熟个体,全球灭绝风险较低,201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定为无危物种。目前在我国是受保护的“三有”(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陆生野生动物,若非法猎捕或破坏其生存环境,则依据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刑法,或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

我又站到了飘窗前,希望有鸟飞进小院子,进入我的眼帘。白头翁、麻雀,就当好啊。鸪鹑、喜鹊的叫声当然也动听。凌晨8点,清脆的鸟鸣从高高的树冠飘落窗内,掀开夜的寂寞,牵来黎明的曙光,让“绿化城市、森林城市”显得更有精气神,那是多么美妙的仙境啊。

恽代英被周恩来誉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是博学多才的革命播火者、是理论宣传战线的前驱者。他先后主编《中国青年》《红旗》等报刊,不仅妙手著文章,还极善于讲演,以真情真理真诚影响了无数革命青年。郭沫若曾言,“代英会做文章,尤其会讲演,他的讲演最为生动而有条理,不矜不持,而煽动力很强”“在大革命前后的青年学生们,凡是稍微有些进步思想的,不知道恽代英,没有受过他影响的人,可以说没有”。

在同时代人的印象中,恽代英的三个特征令人难忘:剃个光头,穿一件“爱国布”长衫,操一口湖北口音。南京大学老校长匡亚明这样回忆道:“现在一提到他(恽代英)的名字,我脑海里就浮现出一个生动的形象:瘦小个儿,灰布窄袖长褂,戴一副度数很深的眼镜,讲话声音洪亮,咬字清晰,演讲时好用短句,停顿,大家叫喊哄哄,鼓动力很强。”恽代英不修边幅的“苦行”形象乍看不起眼,但一开口便令人惊艳。刚到泸州川南师范时,“穿一件蓝布长衫,但已洗得看不见蓝色了”,“不但其貌不扬、衣着土气”,可一请他登台讲演,声震瓦屋,很有煽动力,师生对他的看法马上就改变了。泸州白塔寺通俗讲演所,也是他经常宣传新思想的革命讲台。每逢周末,泸县的市民、学生、中小学教师等等,都喜欢去听他讲演。尽管会场时常容不下这许多听众,他们情愿站在会场外面隔窗倾听。在川南师范期间,恽代英利用寒假组织教师、学生步行考察隆昌、内江、宜宾等县,讲演20余次。恽代英后来在很多学校和训练班当过教员,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都留下了其讲演的身影。恽代英一生四处奔走传播真理,讲演是其日常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五四”纪念会、马克思诞辰纪念日、“五一”节纪念会、“三·一八”惨案纪念会、“二·七”纪念会、廖仲恺逝世纪念会等重大纪念活动上讲演,还应邀到南京、无锡、苏州、扬州、镇江等地出席追悼孙中山大会并发表演说。

恽代英的讲演从来都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而总是从青年的实际需求出发,遇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

“九月一日,开学了”。

这是1954年9月1日,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语文课本第一课的内容。右边,是竖排的楷体字,其中,“9”和“1”是中文写法,“开”和“学”是繁体字。右边,是大半幅黑白素描画。画面上,一扇挂了校牌的铁栅栏门敞开着,三个活泼可爱的男小学生,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走进校门。

其实,前一年小学招生时,我就瞒着父母,一个人神兜兜地去学校报过名。招生告示,是贴在延陵十字街口东边,古桥西边的山墙上。我不认识字,只听几个大人在嘀咕,今年,属狗的才可以报名。我一听,愣住了。因为,我属猪,比属狗的小了一岁。要想今年读书,就只好冒充属狗的去报名了。

那时候,报名不要带户口簿。我以为,是可以蒙混过关的。哪知道,负责报名的荆月辉老师老谋深算,几句话,就把她看出了破绽。她问我,几岁,属什么,我对答如流。我以为,可以大功告成了。可是,她突然又冒出一句,你明年属什么?这一问,出乎我的意料,说,明年属猪。终于,出了洋相,被刷掉了。

第二年,我真8岁,还是一个人去报的名,还是荆月辉老师负责报名的。她还记得我,对我说:“今年,你可以上学了。”从此,我踏进了学校大门,开始了10年的寒窗苦读生活。不,应该是12年。如果,我7岁那年报到了名,那么,高中毕业,我就不会遇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人生,或许就是另一种色彩了。

小学6年,我都是在延陵中心小学读的。但是,由于本部校园面积小,房子少,我在本部只读了一、二年级两年时间。其余4年,都是在校园外面读的。三年级,在西街、北街外的丁家祠堂;四年级,在东街中段的土地庙;五、六年级,在东街顶头的“善善堂”。6年书,我读了4个地方,走了3条街。

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我籍籍无名。四年级升五年级的高小升学考试,我放了一颗卫星,语文、算术总分成绩得了全公社第一名。其中,作文成绩更是出类拔萃,得了全公社唯一的一个满分30分。这样一来,1958年,“九月一日,开学了”,我在学校一下子出了名,“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

恽代英的讲演



1924年5月,恽代英(右二)等在上海孙中山寓所合影。

问题,靠说服,不吹牛,不吓唬人。上海大学是大革命时期革命青年的中心,在上海大学对青年影响最深的人,除了瞿秋白,就是恽代英。他讲课时,中文系、英语系甚至外校的学生都赶来旁听。青年们只要打听到恽代英哪天来讲课,都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课堂上总是挤得满满的。大热天,恽代英连手绢都不带,一连三四个小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讲热了,满头大汗,用袖子一擦,又继续讲下去。恽代英在黄埔军校讲帝国主义、国内政治,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说服力强,

甚至连国民党右派也不敢说讲得不好。恽代英讲课经常不在教室里边,而在操场上,因为教室里装不下那么多人。操场中间放一张桌子,军官喊一声坐下,大家都安静地坐下来,他就爬上桌子开讲。夏天的黄埔骄阳似火,一讲就是几个钟头。偶尔军官忘了让大家坐下,学生们一站几个钟头,也都聚精会神地听完。在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恽代英讲工农运动、学生运动、无产阶级历史地位、共产党的作用、反帝反封建、北伐战争的形势,旁征博引而又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生动活泼、幽默风趣。恽代英

九月一日,开学了

心只读圣贤书”。这个“圣贤书”,就是数理化加英语。光是物理这一门课,我就做完了《高中物理课外练习1000题》。

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喜欢打乒乓球、打篮球、打排球、吹笛子、看小说。进了高中,我壮士断腕,把笛子一折两段,把其他爱好一个个逐步戒掉。我深信,“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只要“头悬梁,锥刺股”,一定能够考取心仪的大学。

遗憾的是,高考迫在眉睫,我遭遇了“文化大革命”。所有的高考材料,全部被压在镇江地区招生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了。我的高考美梦,被彻底击碎了。“无可奈何花落去”,我回到了父亲的衣胞之地种田。这里,是我陌生的地方。在这里,我丢掉幻想,从普通的农民做起,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好评。

1969年,“九月一日,开学了”。这一次,我是以教师的身份走进了学校。这所学校很小,很简陋,没有围墙,没有操场,没有任何教学辅助设施,就连上、下课的铃声,都是用废弃的犁轭头敲出来的。一长溜4个小教室,加两间小办公室,4个教师(其中,3个民办教师),4个班级(其中,两个复式班)。

我在这两所学校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学校就在家门口,我吃、住都在家里。只有星期六晚上,我与包金德老师轮流去学校值一个夜班。在这所学校,我当小学六年级班主任,教小学六年级语文课、算术课和音乐、体育、美术课。我的教师生涯,就是从这所籍籍无名的小学校起步的。

第二年暑假之后,我就像会飞的鸟儿一样,从这所学校飞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第一站,我飞到了离家12里路的巨村学校,这是一所小学戴帽初中。去的时候,是妻挑着行李和米袋子送我去的。在这里,我教初一语文课和初一、初二英语课,担任初一班主任。从此,我告别了小学教育。转来转去,我转了4所学校。从大队到公社,从公社到县城,都是当的初中或者高中教师。

第二站,我飞到了登冠中学,这是全公社的最高学府。在这所学校,我工作的时间最长,经历的事情最多,走过的道

常常娓娓动听地讲几个小时,即便是在武汉炎热的夏天,学生们个个衣冠整齐,汗流浃背,越听越爱听,历久不倦。

恽代英提倡学习牧师宣教时的精神,在其看来,唤起民众非善于辞令不可。早在武昌中华大学读书时,他便已开始练习讲演。每次讲演,都事先打好讲演稿子,不论中文、英文,长篇、短篇,甚至写一二十页的讲演稿子,他都要把它读熟。经过多次的练习,词语丰富了,思想敏锐了,姿态动作灵活了,所以一经登台讲演,便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引人入胜。宣城师范学校的学生后来回忆,恽代英“讲起话来,排山倒海,滔滔不绝,他讲话的技术恐怕任何人也比不了,他常常讲演一连三四个钟头,听的人不感觉疲倦,而且越听越爱听,愈听愈有兴趣,这真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茅盾曾比较过恽代英与萧楚女的讲演风格:“楚女的演词,有如进军鼓角,代英则有幽默讽,有时诙谐,有时庄重。历二三个小时,讲者滔滔无止境,听者亦无倦容。然雅俗共赏,刺激力强,则又为二人所共同擅长。”恽代英反对死读书,主张到群众运动中去,到阶级斗争的伟大实践中去,要善于把革命的任务向老百姓宣传,使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政策,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当年与国家主义派争夺青年时,恽代英等常常和他们唱对台戏。他们的一人讲完,我们就立即有人接上去讲,针锋相对,逐条批驳。经常在这种场合出现的,不是恽代英,就是萧楚女。恽代英亦庄亦谐地批判他们,萧楚女嬉笑怒骂地驳斥他们。恽代英分析深刻,条理分明;萧楚女口齿清楚,坚定有力,取得他们体无完肤。在主持国民党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期间,恽代英还专门对学生做好宣传工作的训练。很多女学员都积极参加练习,有些女生还注意学习恽代英演说的姿势和技巧,有的甚至连他演说的动作都模仿得惟妙惟肖。

恽代英以其文章和讲演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引导他们趋向正确的革命之途。董必武曾在恽代英牺牲30周年时写过一首七绝,对其有这样的评价:“抓住青年进取心,手书口说万人钦。”这也印证了郭沫若所言,“四川那样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恽代英鼓舞的吧。”可见,当年其思想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之强。

瞿秋白翻译《国际歌》

瞿秋白(1899—1935)是常州人。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杰出的文学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他的翻译思想丰富深邃,翻译作品面广量大。在中国翻译历史长河中,他在翻译及翻译理论方面的建树令人瞩目,影响广泛而深远。

瞿秋白的翻译有两个高峰期,一个是五四运动前后,另一个是20世纪30年代。主要译作有:果戈理的《仆御室》等;都德的《付过工钱之后》;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托尔斯泰的十篇短篇小说(和人合作);恩格斯的《致玛·哈克纳斯的信》;列宁的《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托尔斯泰》等;普列汉诺夫的《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等;拉法格的《左拉的“金钱”》;高尔基的《马尔华》《海燕》等;普希金的《茨冈》;别德内依的《没工夫睡骂》;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珂德》。此外,瞿秋白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等。

瞿秋白一生翻译了约200万字的外文作品,其中尤以政论文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主。瞿秋白认为翻译应该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瞿秋白还认为翻译应该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而这种新的言语应当是群众的言语”。在瞿秋白看来,“创造出新的中国现代言语”“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输入新的表现法……使中国现代文更加精密、清楚和丰富”是翻译的首要任务和作用。

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翻译的《国际歌》是国人第一次见到的词曲相配的《国际歌》译本。1923年春夏之交,瞿秋白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并配上简谱,发表在《新青年》季刊第1期“共产国际号”上。

瞿秋白多才多艺,且通音律,为了能使《国际歌》译得便于传唱,他在自家的风琴上,一边弹奏一边吟唱译词,反复推敲,不放过一词一句。比如原文的International,有比较长的一串音,如若意译为“国际”一词,只有两个字,难以与歌曲节拍相合,经再三斟酌,瞿秋白采用音译“英德纳雄纳尔”。他认为:“‘国际’一词——欧洲文为‘International’,歌时各国之音相同;华译亦当译音,故歌词中凡遇‘国际’均译作‘英德纳雄纳尔’。”他认为这样译在歌唱时和各国之音一致,使中国劳动人民和全世界无产者得以同声相应,收万口同声情感交融之效。现在大家传唱的《国际歌》,是中央音乐家协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62年组织专家以瞿秋白的《国际歌》译本为基础修订而成。

除笔译外,瞿秋白还有几次重要的口译活动。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四大”召开,瞿秋白担任了中国代表团的翻译;1924年,瞿秋白陪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前往广州参加国民党的“一大”会议并担任鲍罗廷的翻译;1927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与会并作报告,瞿秋白担任了他的翻译。会议最后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瞿秋白的口译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发展以及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